

乡村振兴战略创新的三个维度

核心阅读

乡村振兴战略在价值、制度及组织三个维度上的创新是新时代的产物。价值维度上的创新是根本方向，制度维度上的创新是重要保证，组织维度上的创新是强劲支撑。这些创新耦合形成乡村振兴发展的不竭动力，将日益推动乡村振兴由蓝图走向现实。

□ 刘丽伟

继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全面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我们党对多年“三农”工作的继承与创新，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正在形成。乡村振兴战略的创新之处可以从价值、制度、组织三个维度来认识，意义重大。

价值维度上的创新

明确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文件指出，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明确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明确乡村振兴的长远目标。乡村振兴是党和国家的大战略，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文件按照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分两个阶段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三个阶段性目标任务作了部署。分别是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制度维度上的创新

高起点。与新农村建设不同，乡村振兴战略首先从国家层面制定战略规划。《规划》通过与文件对表对标，分别明确至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2022年召开党的二十大时的目标任务，细化实化工作重点和政策措施，包括重大工程、重大计划、重大行动等，指导各地区各部门分类有序推进乡村振兴。在此基础上，各地区各部门要编制乡村振兴地方规划和专项规划或方案；加强各类规划的统筹管理和系统衔接，形成城乡融合、区域一体、多规合一的规划体系。

高标准。乡村振兴，法制法规先行。一方面，文件提出抓紧研究制定乡村振兴法，把乡村振兴政策法定化。多年来，特别是2005年新农村建设以来，我国形成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政治措施，需要制度化、法制化，同时各地方可以从本地乡村实际需要出发，制定促进乡村振兴的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为乡村振兴提供法律保障；另一方面，文件提出研究制定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把党领导农村工作的传统、要求、政策等以党内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完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确保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实施。这意味党对“三农”的领导法制化了、制度化了。

高质量。乡村振兴的制度性供给，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旨在激活主体、激活要素、激活市场，全方位高质量地服务于乡村振兴。其中，若干制度创新值得关注：如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农民房屋财产权；推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探索农村集体经济新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机制，上述举措旨在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改进耕地占补平衡管理办法，建立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新增耕地指标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机制，将收益通过支出预算全部用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支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一创新性政策举措改变了以往增减挂钩、占补平衡均取之于乡、用之于城的做法，通过跨省域调节，可以大大提高节余指标的含金量并用以反哺农村。创新培训机制，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技术协会、龙头企业等主体承担培训；建立县域专业人才统筹使用制度；全面建立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到乡村和企业挂职、兼职和离岗创新创业制度，探索公益性和经营性农技推广融合发展机制，这些制度创新有助于构建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农业经营者队伍。

组织维度上的创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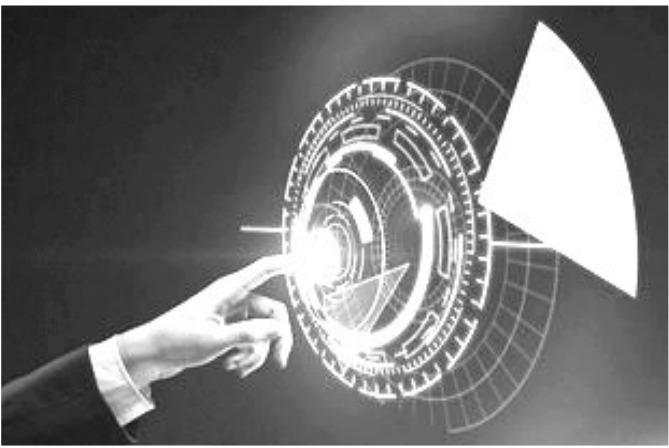
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打造一支新时代“三农”工作干部队伍。实施乡村振兴，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确保党在农村工作中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这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保证。为此，文件强调健全党委统一领导、政府负责、党委农村工作部门统筹协调的农村工作领导体制。建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责任制，实行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党政一把手是第一责任人，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县委书记要当好乡村振兴的“一线”总指挥。按照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要求，打造新时代的“三农”工作干部队伍。

惩治“微腐败”，打造强有力的农村基层党组织。管党治党，从基层党组织抓起。文件提出，推行村级小微权力

清单制度，加大基层小微权力腐败惩处力度。严厉整治惠农补贴、集体资产管理、土地征收等领域侵害农民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扎实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突出政治功能，提升组织力；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创新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持续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稳妥有序开展不合格党员处置工作，着力引导农村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优化农业从业者结构，加快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农业经营者队伍。文件首提培育一批家庭工场、手工作坊、乡村车间，鼓励在乡村地区兴办环境友好型企业，实现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提供更多就业岗位。上述经营主体及农业企业、家庭农场主、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农业经营者的骨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须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文件指出，统筹兼顾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扶持小农户，积极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我国现有两亿多小规模兼业农户，多数年龄偏大，有的是老人和妇女。现阶段之迫之举，是采取针对性措施，把小农生产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使之分享到现代农业发展红利。

壮大农业龙头企业和行业组织，带领我国农业“走出去”。文件提出，积极支持农业走出去，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粮商和农业企业集团。农业企业特别是龙头企业能够引导小农户参与系统内的分工协作，使农民由传统的农业生产者向具有市场意识、竞争意识、投资意识、风险意识的现代产业工人或农业企业家转变，从而解决土地配置碎片化、生产经营分散化问题，整体提升农业的产业层级和质量效益。农产品行业协会是由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大户以及相关科研、教学和其他组织、个人参加，为维护和增进全体会员的共同利益，在自愿互利基础上依法组织起来的非营利性组织。农产品行业协会可以跨地域、跨组织发展，能够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和水平上提高农民和农业经营者的组织化程度，实现小农户和农业经营与国内外市场对接，降低市场风险和交易成本，有助于带领我国农业“走出去”。



近些年，中国的大数据技术及相关应用得到了快速发展。从2014年到2017年，大数据的概念已经连续4年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要在新一代移动通信、大数据、先进制造等方面赶超先进。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促进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广泛应用。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入推进“互联网+”行动和国家大数据战略。2017年12月8日，中央政治局就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立健全大数据辅助科学决策和社会治理的机制，推进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

大数据有助于政务信息公开化

大数据技术有助于打开政府横向部门间、政府与市民间的边界，信息孤岛现象会逐渐消失，政府数据的共享和公开将成为可能。首先，大数据技术可以集中各部门的数据资源形成“数据云”，制定访问协议并分配访问权限，各部门根据需要在权限范围内获取云端数据，这种方式打破了原有时间和空间的束缚，提高了数据共享效率。其次，基于大数据的政务信息开放和共享平台，利于打造阳光政府和推动万众创新。大数据让行政过程更加公开透明，公众可以实时监督政府行为，督促公务人员提高工作效率，使“幕后交易”“暗箱操作”等违法违规行为无处遁形，使得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政府数据对企业 and 公众开放，将激发社会力量的创新潜能，为万众创新提供良好条件。最后，大数据技术有助于规范政府各部门的数据存储标准，弱化各自为政的思想，增强各部门间数据的一致性。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政府智能系统，可以有效地解决政府部门间数据的冲突或矛盾等问题。

大数据有助于公共服务精细化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以往政府的公共服务对每个人都是相同的，由于技术的限制很难针对不同人的特征进行精细化管理。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需求也在不断升级。公众已经不再满足于被动接受服务，而是希望选择能够符合自身要求的个性化的公共服务，因此，政府公共服务的精细化将越来越重要。大数据技术以其准确、全面、高效、智慧等特性，将“人类普遍”还原为“人类特殊”，能够满足公众的个性化需求，为政府公共服务精细化提供了技术支持。例如，精细化的交通管理，大数据技术能够根据城市实时、全面的路

运用大数据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水平

□ 平健

况信息，快速合理、精细准确地调整交通管理策略，提高道路使用效率。此外，大数据推动政府公共服务精细化还可以应用到公共安全、公共卫生、食品安全、人口管理等领域，这种方式的广泛应用和全面覆盖，将满足公民的个性化需求，提高政府的公共管理能力。

大数据有助于政府决策精准化

决策是政府管理的核心环节，决策水平决定着政府公共管理的成败。数据和信息是决策的基础，关乎决策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传统的政府决策方式，是通过座谈会、听证会和公民意见搜集信息，而这些信息严格来说属于小范围的抽样调查数据，数据和信息本身就是不全面的，制定出来的决策难免出现偏差。大数据技术摒弃了抽样调查和经验判断等传统决策方式，利用数据融合、数据挖掘、智能运算等技术，使用完整的、全面的信息进行分析，得出的决策方案更加的科学合理。正如美国著名学者丹尼尔·埃斯蒂所说：“任何精英或利益集团的判断都是片面的，只有相信基于整体分析的大数据技术，政府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进而提高其管理效率。”大数据技术将模糊决策转化成精准决策，增加了决策的科学性。此外，大数据技术对信息的收集、分析和处理过程是实时的，保证了决策的时效性。这让本来静态的政府决策动态化，大幅提升了决策的效率。总而言之，大数据技术可以充分利用政府拥有的信息资源，为政府决策的科学性提供保障。

新时代增强文化自信的基本途径

□ 刘翰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深刻指出：“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征程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众文化，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基本途径。

优秀的大众文化是增强新时代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

在中华民族数千年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积淀了非常灿烂的文化，产生了许多伟大的文化作品，出现了许多伟大的文化大家，这是当前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底气和底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就了中华辉煌的历史，也闪烁着时代的光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哺育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彰显了中华民族不甘困苦、不畏强暴、奋发有为的高贵品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力量之源。

从大众文化发展史来看，西方大众文化发展较早，产生于工业文明逐渐兴盛的20世纪初。我国的大众文化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文化形态。大众文化以市场为导向，具有现代性、可复制性、商品性、通俗性、娱乐性等特征，具体的大众文化产品与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先进文化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大众文化的灵魂

任何一种文化都内在包含着价值观念，体现了所尊崇的价值准则。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遵循的价值准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毫无疑问，在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众文化的过程中，必须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准则，以是否传播核心价值观作为检验大众文化思想性、理论性的重要标准。

核心价值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众文化的价值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众文化体现和反映的是新时代中国人民进行伟大实践、实现伟大梦想的文化价值观念。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映和体现了中国人民共同的价值观念，既有传统价值的精髓又有现实的价值追寻，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愿望和意志。大众文化以核心价值观为原

则，能提升其整体价值内涵，重新塑造大众文化产品的灵魂。

核心价值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众文化的价值诉求。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而发展的大众文化，由于文化产业的壮大而日益兴盛。大众文化产品也日益丰富，无论文化产品的种类、数量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因此，在大众文化生产过程中，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准则，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大众文化必须坚守的价值共识与价值立场，发挥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导向功能。

大力培育新时代大众文化产品

文化自信，从根本上说，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认同和坚守。被世界各国人民所认同和赞誉的文化产品越多，人民的文化自信也就越强。因此，增强文化自信，就要采取多种措施多下功夫。

要坚持“双轮驱动”，大力发展大众文化产业。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十三五”规划纲要都提出了“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加快文化改革发展”的战略思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坚持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双轮驱动”，在高度重视发展文化事业的前提下，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通过文化的创新发展文化产业。在注重文化产品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多地注重社会效益。以生产优秀文化产品，更好地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

